

一部《红岩》血凝成

石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我正搜集资料,着手写《萧也牧悲剧实录》时,萧也牧的长子吴家石特意给我送来了由萧也牧起草的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稿。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并望立即得到您的回信。

紧紧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没过几天,我在张羽遗孀杨桂花提供给我的一批资料中,又发现了这封信的草稿(复印件),草稿右侧有“江阔23/7”及注明“航空”邮寄的字样,这说明,此信发出前是经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审定过的。从信中“以跃进的精神”这一特定用语来判断,此信无疑写于时处“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当时没有复印设备,约稿信写成后,加盖公章发出前,抄录一份存档。吴家石给我送来的,当是那份存档的复印件。由这封信,引发了我对红色经典《红岩》诞生历程的探究。

有关这封约稿信,江晓天生前曾在《早该还历史真面目》一文中回忆:“一九五七年底,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张羽、黄伊都向我谈过,《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后,社会反响很强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还很多,建议他们再写长的。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成立了文学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简称‘献礼’小组),以邵荃麟和严文井同志为首,我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参加。各省、市作协协会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纳入规划的主要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九五八年七月,我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马上叫吴小武(即萧也牧,原编辑室副主任,错划‘右派’,决定下放,因为他负责编辑《太阳从东方升起》未完,我把他留下工作一段时间)给三位作者写了封信。”(《四川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由此可见,追溯《红岩》的由来,还得先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说起。

曾在一九五七年参与《红旗飘飘》丛刊创办的王扶告诉我,就在编辑部安排第二集稿件时,收到了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写于四月十一日的一封信,说他听了罗广斌同志演讲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深受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编辑部在原先制定的选题计划中,本就有一项是拟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赵山林信中的建议,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约稿线索,可谓不谋而合。于是,就由她起草了一封给罗广斌的约稿信,请他最好能在五月二十日前将《中美合作所血录》稿寄达《红旗飘飘》编辑部。

罗广斌未能如约在五月二十日前将演讲稿寄来,直至十一月十五日,《红旗飘飘》编辑部才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们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时期间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只讲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这篇副题为《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烈士们的回忆录全文一万余字,共分六节:《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和《最后的时刻》,揭露了蒋美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山下“罪犯集中营”里犯下的血腥罪行,是

一曲革命先烈奋勇斗争的悲壮颂歌。经张羽做文字加工和萧也牧审定后,安排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发表。

二

一九五八年秋,在中青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带王维玲(原在总编室工作,已内定调文学编辑室任秘书)去四川出差时,江晓天考虑到朱语今曾在西南局工作多年,与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熟悉,就请他无论如何为《禁锢的世界》三位作者请下创作假,以便集中精力早日把稿子修改出来,不然,就赶不上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了。王维玲从重庆回京后,向江晓天作了汇报,说刘德彬由于在一九五七年“鸣放”中说过“错误”,一九五八年整风补课,说他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刚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马上准创作假不合适,萧泽宽只批准了罗广斌、杨益言两人的创作假。罗、杨二人经过大半年的突击修改、写作,整理出了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青社收到《禁锢的世界》第二稿,署名仍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考虑到定稿前的编辑加工量较大,江晓天请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且赏析能力和文字工作水平较高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马上叫吴小武(即萧也牧,原编辑室副主任,错划‘右派’,决定下放,因为他负责编辑《太阳从东方升起》未完,我把他留下工作一段时间)给三位作者写了封信。”(《四川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由此可见,追溯《红岩》的由来,还得先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说起。

罗广斌、杨益言在听取了江晓天和毕华、王维玲的意见后,一面修改作品,一面学习、参观、访问。当时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尚未正式开馆,他们提提先登,在那里看到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许多重要文献的手稿,使他们大大地提高了对渣滓洞、白公馆当年的局部斗争和全局关系的认识,“好像航行在迷雾里的船只,忽然看见了灯塔”,加快了第三稿的进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九六〇年秋,原五编室属于人物传记、回忆录的部分工作归入文学编辑室。刚回到文学编辑室的张羽,担起了编发《禁锢的世界》的重任。

张羽欣然接受为《禁锢的世界》当责编的任务之后,认真读了总计约八十万字的第一稿和第二稿。他感到可喜的是,作品描写的生活场面比《在烈火中永生》宽阔了,虽人物众多,但刻画细致了,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奇特,引人入胜了。然而,对于监狱的日常生活描写,作者还没有完全从低沉的基调中跳出来,总的感觉,正如作者后来认识到的:“满纸血腥,不忍卒读,让人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沙汀和王觉同志《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烈士们的回忆录全文一万余字,共分六节:《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和《最后的时刻》,揭露了蒋美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山下“罪犯集中营”里犯下的血腥罪行,是

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张羽为了便于和他们交流情况,及时解决,也搬进他们的宿舍,三床、三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杨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广斌改定后再交张羽加工处理;张羽对稿件进行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交罗、杨传阅;三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几乎每个晚上,三人都是彻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后,才各自上床,蒙头睡觉。在这次修改中,张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据他在《我与《红岩》》中回忆:这一稿“除一般性修改的章节外,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部分约有十万字,可见修改工程之大。”“我和罗广斌合作得非常得心应手。在修改过程中,对有些设计,我提出几个方案,任他挑选。他很机灵,很快就从里面挑选出一个最佳方案。我们两人总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同他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我们既是编辑和作者的身份谈业务,又是作为战友和至交谈生活,谈创作,交流思想,切磋技艺,直面问题。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使用过外交辞令,而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各抒所思、所想。和老罗的合作,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最令人难以忘却、最值得回味的一幕。”

正式发排之际,用什么作书名,又煞费苦心。当时,编辑部和作者拟有“地下长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红岩朝霞”“红岩巨浪”

一九八二年,卢新华大学毕业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上海市委当官,到军队当中校作家,到北京《人民日报》当团委书记。最后,卢新华选择了和自己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汇报》的工作,成了一名文化记者。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工作条件优越的报社,到深圳创办了一家实业有限公司。

卢新华在上大学时曾看到的一部电影震住了,原来地球上还有那样的一群人。那样的一群人过着那样的一种生活。经历了多年的混沌封闭,那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内心在苏醒,感受到内心涌动着巨大的冲动和好奇,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生活。在那一刻,似乎这比他们已有的成功还重要。所以,他决定去美国。

卢: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思想、心灵、精神的绝对自由。但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相对的自由对我很重要。但是那意味着你要放弃获得的那些名利。庄子曾说,我宁可污泥中自贱,也不要命于哪一个人的命令,被他们拴在鸟笼里,当个鸟养。

一九八六年九月,卢新华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

卢:我当时带上全部家当,大概有五六百美金。跟我在飞机上同座的是杭州工业大学一个姓孙的。当时我们在飞机上就讲好了,我说我有一个同学来接我,万一不来接的话,就跟你先回去,假如你的邻居不来接我的话,我让我同学送你先接回去,这是心里做的最坏的打算。

当时心里有点紧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什么都不怕,也没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当年的卢新华已经成为过去了。

和很多小说描写的情节雷同,卢新华在机场没有见到同学,到孙姓朋友邻居的家中过了一个月“混吃混喝”的日子后,才在就读的学校附近找到一间空房之地。

卢:房子很小,一对温州的夫妻住在里边,我住在外面,厨房就在旁边。他们早上起来在旁边炒菜干什么的,我照样睡。我的空间就是一进门的一个小客厅。

交完房租和学校的注册费,卢新华已身无分文,靠向朋友借钱度日。

卢:当时我每天经过公园的时候,都会低头看地下,谁都不知道我

“红岩破晓”“万山红遍”“嘉陵怒涛”等十个名字。经反复斟酌,最后一致商定,并报请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批准,取名为“红岩”。这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是党中央代表团的驻地,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也曾在此居住。给这部小说取名《红岩》,就意味着国统区的人民是在党的光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才迎来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上发表,到《红岩》的最后定稿,历时近五年,中青社的江晓天、萧也牧、张羽、黄伊、王扶、毕华、王维玲等编辑,都不计个人得失,为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功付出了辛劳,可以说,这部书稿不仅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的成果,也是这群文学编辑心血的结晶。这对于作者和编辑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红岩》于一九六一年末问世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

始料不及的是,“文革”运动开始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被造反派毒死了。杨桂花告诉我,二月二十三日,躲避造反派组织追捕的刘德彬和杨益言逃到北京,把罗广斌从被绑架到逃死的经过告诉了张羽。刘德彬还对张羽说:“他们造老罗的谣,一是说他是叛徒,二是说他‘文革’中是政治抓手,三是说《红岩》不是他写的,是重

在看什么。我那时候就想,如果能像电影《百万英镑》里面一样看到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就好了,所以就很注意看地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到。

卢新华操着蹩脚的英语开始外出找工。一天,在游人如织、素有“小巴黎”之称的西木村,卢新华看到一些白人蹬着三轮车招揽游客,当听说干这活收入不错后,他循着广告走进了一家公司,申请做“三轮车夫”。

卢:开三轮车公司的是一对德国人,女的叫派克,男的叫周立。周立问我,你有经验吗?我就跟他吹牛说我家就是开三轮车的。他说,你会修三轮车吗?我说当然会修了,什么都摆弄得了。他让我跟戴维走,戴维是一个法国留学生。骑三轮车跟二轮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穿了过去,正好周立在楼上没看出来,要不然就露馅了。

戴维把卢新华带到一条繁华的街道后,就蹬着三轮招揽自己的生意去了。本以为了蹬三轮只是个简单体力活的卢新华,一时不知所措。

卢:我对做生意一无所知。本以为了像摆渡一样来回接送人,也不知道吆喝。后来才知道要喊一喊,手一甩,有人就上来了,然后怎么收费,怎么找钱就不知道了。

对蹬“洋”三轮的生意一无所知的卢新华无奈采取了“守株待兔”的被动战术,但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不是客人,而是警察。

卢:警察过来对我唧唧咕咕讲了一通,然后开一张罚单,后来我才明白车灯是要打开的。心里很难过,一分钱没挣就来一张罚单。过了六个小时到九点了,还没办有一个客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觉得,我卢新华现在怎么干起这个来了?那时我只想挣点钱,什么面子都没有了,没有钱怎么养活自己呢?

快十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人在喊“TEXI”(出租车),我看旁边没有“TEXI”。他还在喊并朝我招手,我说“ME, TEXI, ME”,他说“YES, YES”。于是,我的这第一个客人来了。

他们是一对夫妻,并且是我的校友。很多年之后他们回来怀旧,说要去校园转一圈怀旧去,那

我的父母和傅作义将军夫妇是旧交,他们的交情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时傅先生驻防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市)。一九四九年,我们一家在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返回祖国。父亲曾经问过傅先生,他是如何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傅先生则轻松地用一句玩笑带过:“你们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来,作为制高点的景山必会遭炮击的,怕你们家毁了,所以我不打了。”

后来,“三反”运动中父亲被关了十个月,审查是否为美国特务。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门来看母亲,傅先生问父亲被关会不会和他有关,如果有关,他可以到有关方面去讲清楚。母亲深谢他们夫妇的关心,但说父亲的被关看来与傅先生没有关系。

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年轻的,我分分秒秒地被饥肠煎熬,时时刻刻盼望着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已经移居天津的父母有一次来北京,傅先生用他的名义在政协礼堂的餐厅订了一桌饭,正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和姐姐也被叫去了。记得那天在座的还有黄绍竑先生。这顿饭,是我那三年中唯一填饱了肚子的一顿,后来被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久久不能忘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开始入户抄家,许多亲友被斗争、被殴打、被抄家。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受到冲击的人被打死或自杀了寻常事。待到这一年冬天,抄家、破“四旧”的高潮已过,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回头来看看,所谓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把

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行为相继失败。卢:我又归零了。那一阵子日子很难过。作为一个男人,有家庭的责任,作父亲有父亲的责任,作儿子还有儿子的责任。后来偶然在做金融期货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在洛杉矶有赌场,收入也不错。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而且我也蛮喜欢玩牌的,后来就去了赌场。

养家糊口的压力逼迫卢新华必须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他选择了去赌场做发牌员。通过国际发牌学校三个月的专业学习和考试,卢新华获得上岗证书,进入了洛杉矶的一家大型赌场,经过

一系列的培训、评估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发牌员。卢新华从赌场重新开始,而这时,和在西木村蹬三轮车一样,他又成为了赌场被围观的一景。卢:后来到了桌子上发现,有人来围观看我。后来国内也有人在美国看到了我,回来写文章,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赌场还有个卢新华在这里,都成一景了。偶尔沮丧的时候会受影响,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想好了去要的时候,和被迫是不一样的。我不担心混得不好,相反我还挺得意我什么都能做。把我的笔全拿掉,我照样能生存。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选择,我们的时代需要行为、思想都一致的人。

卢新华在谈到小说《伤痕》的巨大成功时,相当平静,已经离着一段距离来看那段历史了。反倒是在讲到三轮车、赌场经验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似乎那段生活更让他感到亲切。他谈笑风生,看不到任何苦涩、悲情,坦然而轻松。有时候,他看自己的生活像看某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这恐怕和媒体曾在大洋这边对他生活状况的描述有着不小的出入。卢说,任何生活,只要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坦然受之。放下了高低贵贱之分,人就自由了。况且,一切生活都是创作的素材,这么看起来,就格外有意思了。

卢:这时候我就是上帝,我决

定着他们的命运。牌发出去以后,就看到财富如流水一般流到这儿流到那儿。这个人面前堆了一大堆筹码,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光掉了,走掉了。后来又有人上来了,这些众生相就是这样的。你起来我下去,他起来我下去。我有时想这些来赌场玩的人就是些猪、羊。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做“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赌场老板的口袋里去了。

卢新华说,他不后悔人生的任何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如今,再和他提起多年前让他一举成名的《伤痕》,他并不是非常热衷,也通常看不到太多激动,他甚至总是调侃说,你看,又在提那档彩票了,卢新华爱用彩票来形容当年的成功,因为在他看来,他更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幸运。

近年,卢新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频繁地往返于上海与洛杉矶的两个家之间。半年时间在上海读读书,见见朋友,写自己的小说。半年时间回美国陪老婆孩子。卢新华说,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当作家能够及格就行。

卢:如果让我回想三十年前,我会想,《伤痕》不是我写的,只是我想了一个我的名字,《伤痕》是无数个中国人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凄惨的遭遇,用他们的经历,来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我不过是一个执笔者,我不写也有别人写,但是很幸运的,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去完成这样一件事。

(本文为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文字资料)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傅先生就说到他自己的经历:“八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杀人的?’我不说我没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老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

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老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在当时的形势下,傅先生的这一席话,给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辞时,傅先生不理睬我伸出的手,径自朝墙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样他要亲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劝阻。傅伯母在一旁说:“他正好要做散步。”

就这样,傅先生陪我穿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才与我握手告别。

(摘自《温故》十一辑)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傅先生就说到他自己的经历:“八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杀人的?’我不说我没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老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

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老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在当时的形势下,傅先生的这一席话,给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辞时,傅先生不理睬我伸出的手,径自朝墙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样他要亲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劝阻。傅伯母在一旁说:“他正好要做散步。”

就这样,傅先生陪我穿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才与我握手告别。

(摘自《温故》十一辑)

「文革」中拜访傅作义

仲辉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傅先生就说到他自己的经历:“八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杀人的?’我不说我没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老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

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老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在当时的形势下,傅先生的这一席话,给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辞时,傅先生不理睬我伸出的手,径自朝墙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样他要亲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劝阻。傅伯母在一旁说:“他正好要做散步。”

就这样,傅先生陪我穿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才与我握手告别。

(摘自《温故》十一辑)



了,什么都摆弄得了。他让我跟戴维走,戴维是一个法国留学生。骑三轮车跟二轮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穿了过去,正好周立在楼上没看出来,要不然就露馅了。

戴维把卢新华带到一条繁华的街道后,就蹬着三轮招揽自己的生意去了。本以为了蹬三轮只是个简单体力活的卢新华,一时不知所措。

卢:我对做生意一无所知。本以为了像摆渡一样来回接送人,也不知道吆喝。后来才知道要喊一喊,手一甩,有人就上来了,然后怎么收费,怎么找钱就不知道了。

对蹬“洋”三轮的生意一无所知的卢新华无奈采取了“守株待兔”的被动战术,但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不是客人,而是警察。

卢:警察过来对我唧唧咕咕讲了一通,然后开一张罚单,后来

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行为相继失败。卢:我又归零了。那一阵子日子很难过。作为一个男人,有家庭的责任,作父亲有父亲的责任,作儿子还有儿子的责任。后来偶然在做金融期货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在洛杉矶有赌场,收入也不错。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而且我也蛮喜欢玩牌的,后来就去了赌场。

养家糊口的压力逼迫卢新华必须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他选择了去赌场做发牌员。通过国际发牌学校三个月的专业学习和考试,卢新华获得上岗证书,进入了洛杉矶的一家大型赌场,经过

一系列的培训、评估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发牌员。卢新华从赌场重新开始,而这时,和在西木村蹬三轮车一样,他又成为了赌场被围观的一景。卢:后来到了桌子上发现,有人来围观看我。后来国内也有人在美国看到了我,回来写文章,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赌场还有个卢新华在这里,都成一景了。偶尔沮丧的时候会受影响,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想好了去要的时候,和被迫是不一样的。我不担心混得不好,相反我还挺得意我什么都能做。把我的笔全拿掉,我照样能生存。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选择,我们的时代需要行为、思想都一致的人。

卢新华在谈到小说《伤痕》的巨大成功时,相当平静,已经离着一段距离来看那段历史了。反倒是在讲到三轮车、赌场经验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似乎那段生活更让他感到亲切。他谈笑风生,看不到任何苦涩、悲情,坦然而轻松。有时候,他看自己的生活像看某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这恐怕和媒体曾在大洋这边对他生活状况的描述有着不小的出入。卢说,任何生活,只要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坦然受之。放下了高低贵贱之分,人就自由了。况且,一切生活都是创作的素材,这么看起来,就格外有意思了。

卢:这时候我就是上帝,我决

定着他们的命运。牌发出去以后,就看到财富如流水一般流到这儿流到那儿。这个人面前堆了一大堆筹码,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光掉了,走掉了。后来又有人上来了,这些众生相就是这样的。你起来我下去,他起来我下去。我有时想这些来赌场玩的人就是些猪、羊。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做“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赌场老板的口袋里去了。

卢新华说,他不后悔人生的任何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如今,再和他提起多年前让他一举成名的《伤痕》,他并不是非常热衷,也通常看不到太多激动,他甚至总是调侃说,你看,又在提那档彩票了,卢新华爱用彩票来形容当年的成功,因为在他看来,他更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幸运。

近年,卢新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频繁地往返于上海与洛杉矶的两个家之间。半年时间在上海读读书,见见朋友,写自己的小说。半年时间回美国陪老婆孩子。卢新华说,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当作家能够及格就行。

卢:如果让我回想三十年前,我会想,《伤痕》不是我写的,只是我想了一个我的名字,《伤痕》是无数个中国人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凄惨的遭遇,用他们的经历,来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我不过是一个执笔者,我不写也有别人写,但是很幸运的,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去完成这样一件事。

(本文为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文字资料)